

是

● 杜 导 正 ●

SHI YU FEI

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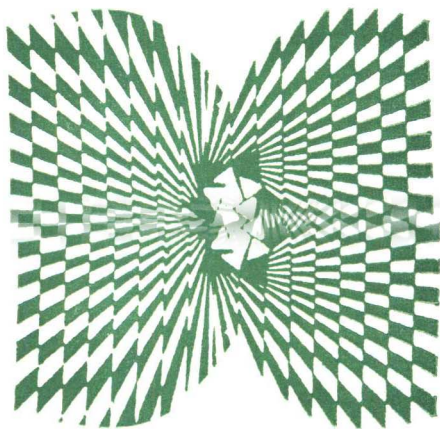
非

四川人民出版社

是与非

——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

● 杜 导 正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成都

责任编辑：刘周远

封面设计：邱云松

是 与 非

——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

杜导正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2.5 插页6 字数270千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1145-8/D·227 印数：1—2820册

定价：5.40元（软精装）



① 1957年陶铸同志与来广州的贺龙同志合影。左二为曾志同志，右二为苏汉华，右一为本书作者。



▲③1979年夏作者访问湖北省赤壁公社，与农民谈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喜悦。《农民都夸三中全会政策好》一文就是此次采写的。

▲②1979年9月末于山西省大同前线阵地上。由左向右依次为本书作者、记者张帆、作家魏巍、记者姚熔炉。





④ 1964年，以新华社社长朱穆之为团长的新华社访朝代表团在朝鲜东海岸名胜——金刚山上八潭。前排右三为朱穆之，左三为刘国梁，左二为作者；后排右一为张磊，左一为李峰。



⑤ 1981年5月，作者在陕西西安市“捉蒋亭”下与老农合影。老农摆个汽水小摊，予游人方便，自己也有收入。“文革”时这是不许可的。



⑥ 成吉思汗陵墓附近——内蒙古伊金霍洛地方，发生了多大变化啊！沙漠上树木虽疏虽嫩，但毕竟有了，正在蓬蓬勃勃地生长，蒙族人民使用上了驴拉胶皮轮车，年轻妇女也打扮时髦了。（1985年秋）

自 序

这个集子记载着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些历史的零星场面，记载着我40余年记者生涯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集子为我们党所领导的新闻发展史研究工作增添了一份朴实无华的原始性笔录。

朋友们劝我编这个集子许多年了，我有心无力，拖了下来。现在，当我编完这个集子，想到它就要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掩卷沉思，我愈加明晰了这样一点：数十年来，我在事业上的成功与失误，感情上的欢欣与烦恼，几乎总与农民问题缠在一起。因此，我将自己的小传定名为《农民记者》，并将它置于卷首。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参加革命后在根据地做农民工作。战争年代，我记叙的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为主角的事件。共和国建立以后，我这支笔始终是循着农村发展的轨迹而移动的：土地改革、互助组、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人民公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包产到户、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等。可以说，建国4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包括进步与繁荣、狂热和灾

难,我都严肃地尽我所能作了一些如实的、片断的记录。我所撰写的新闻业务论文大多谈的是采访农民的心得体会;就是有关国内政治运动的报道、出国访问归来所写的考察报告,甚至那些回忆故人的文字,也往往不得不围绕着农民问题去展开。有关农民问题的文字是这个集子的主体。有人曾经问我:老杜,你为什么对农民问题如此感兴趣?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陈云同志曾说过,中国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农民这个大头安定了,天下太平,否则,……。这是入骨三分的至理名言。过去、现在、甚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农民问题在我国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绝不可能不极度关注这个问题。

如实地、客观地记录是非功过,是我编这个集子的主旨之一。在编辑过程中,我产生了这样两个想法:

一、如实地记录已经发生的事实是记者的职责所在。这种记录一旦变为铅字,公之于众,便不再属于作者本人,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即使作者本人也无权对他所记录的历史事实作带功利目的的取舍和增删。不论这些文字精美也罢,粗鄙也罢;所记录的人和事正确完整也罢,荒谬残缺也罢,只要作者的报道是如实的、客观的,就有价值,即史料的价值,认知的价值。中国古代有为圣人隐的传统,其实,人家既已成为圣人,还用得着为他隐瞒什么吗?所以,为圣人隐这句话落到实处,每每便成了为作者自己隐啦!隐,实际上是很愚蠢的。有朝一日,后人在阅读我们留下的文字时,如果看到的只是莺歌燕舞,听到的只是潺潺流水,是会诅咒的。倘若他们仰天发问:真是这样的吗?!我们将何颜以对?在编辑过程中,我如实地尽力

收进了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销毁了，有一些因年代久远失落了，很遗憾，这些收不进来了），其中一些作品所记录的事实已为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或基本错误的。对所收进的文字，除极个别地方作了纯技术性的处理外，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列宁将历史的发展归纳为呈螺旋型的前进态势，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那些使我们这一代人迷惘痛苦的问题，那些我们现在觉得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那么严肃对待的狂热产物，如高级社、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瞒产、反右倾、大批判（至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就更不用说了），等等，何尝不会又以新的花样程度不同地再展现于后来人的面前呢？后来的人们要想避免重蹈我们失误之辙，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我在想，假如有心的人为了研究和了解这段历史，翻到了这个集子，浏览之后认为它所提供的文字比较真实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记录了我们因为失误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没有弄假，没有造作，可以放心地引证和借鉴，继承优点，把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避开短处，不犯或少犯前人所犯的错误，那么，我现在的一丝用心便得到百倍的报偿了。

二、我现在所辑的文字，主要是给年青记者看的。将我们这些老记者的成就和经验叙述给后人，自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然而，坦诚地剖析老记者自己的失败与教训，何尝不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呢？由于时过境迁，身入暮年，由我们这些老记者自己来弥补昔日的过失怕难都做到了。但记者的历史是延续的，我们的事业将由年青一辈的记者加以继承。而年青一辈的记者们总是要重犯一些类似老记者们所犯

的错误。这虽不幸，却是无法回避的。回顾我自己40余年的记者生涯，有清醒，也有糊涂；对错误的东西有抵制，也有盲从，有时甚至还给错误的东西火上浇过油，助长了错误的恶性发展。总结一下40余年的经验和教训，我体会很深的一点是：一个记者一生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计较个人的生死荣辱，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情都要以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为出发点；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采访写作中要坚持调查研究；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对的敢于坚持，错的勇于改正；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不写违心的文章。这些在我的“小传”中作了较为系统、扼要的交待。我在这个集子中一些文章的前面或后面所写的编前或编后话里，对自己当时写这些文章时的心境、得失简要地总结了一下，话虽不多，但都是心里话。就我而言，是很想通过这个集子与现在和未来的年青记者们谈谈心的。只要这个集子所提供的东西能对年青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培养崇高的理想有所启示，对他们保持较为清醒的鉴别能力有所帮助，使他们在新闻实践中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把握住自己，那么，这个集子就可谓善莫大焉了。

作者

一九九〇年秋

目 录

- (1) 农民记者 (自传)
- (46) 烈士证
- (49) 扭转郢二傻
- (53) 爱兵的班长
- (56) 九次作战无伤亡
- (60) 哭蔡春吉同志
- (63) 机智
- (65) 访海福龙团长
- (69) 子牙镇歼敌记
- (73) 群众斗争能够干涉吗？
- (76) 翻不透心能不能发动斗争？
- (80) 三间堂屋
- (85) 不要满足于形式上组织起来了
- (89) 对农民手中的商品粮和余粮的调查
- (94) 龙冲乡农民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 (107) 他离不开警察——驳“农民处在饿死的边缘”

- (111) 麻袋包下
- (114) 在大字报的村庄
- (119) 广东省农村宣布“放开肚皮”，
 一日三餐干饭不要钱
- (121) 新的追求——东江、韩江旅行散记
- (128) 党，灾民信心和力量的泉源
 ——从东江重灾区来
- (136) 想不到变得这样快
 ——再访东江重灾区
- (143) 金稻伴新村
- (149) 石滩公社抗灾纪实
- (159) 雷南县成功地解决了粮食瞒产问题
- (168) 广东省反瞒产挖出黑粮28亿斤
- (172) 山沟里飞起了火凤凰
- (178) 我们每吃一顿饭都应想到农民的
 生活——发展多种经营，增加
 社员现金收入
- (186) 乐昌县农民对农村土政策的四条意见
- (192) 广东省委紧急部署批林批孔

- (195) 肇庆地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有关政策调查
- (201) 个体农户松散的经济协作
- (206) 人不是神仙
- (210) 农民都夸三中全会政策好
- (212) 附：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
- (213) 淡绿轻抹虎头山
- (217) “我第一次戴上了手表”
- (222) 陇上晨曦——甘肃省河东老灾区漫记
- (242) 启发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
——访甘肃武都地委书记钟永棠
- (253) 山西雁北农村见闻录
- (266) 一位县委副书记谈话的原始记录
- (270) 万户欢唱致富歌——雁北地区新民谣
- (277) 《光明日报》几位记者编辑座谈
晋北农村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 (287) 关于干部廉洁问题给领导同志的信
- (290) 关于干部廉洁问题再次给领导同志的信

- (298) 记者的调查研究工作
- (312) 让反客里空的警钟长鸣
- (320) 改革通稿，为报刊服务
- (325) 办报当中的七个关系
- (335) 记者的风格和语言
- (342) 全力把握时代的脉搏
- (349) 改进国际宣传
- (355) 在改革中闯出自己的路
- (364) 锐意革新、开拓前进
-
- (367) 一团火
——怀念杨芬皋
- (373) 他的心和中国农民贴在一起
——忆陶铸
- (384) 启蒙老师
——深切缅怀邓拓同志
-
- (391) 后记

农民记者

1986年6月末到7月中，我和两个记者到山西省雁北地区调查了解农村情况。这是1982年我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以来第二次去雁北农村。报社内有的同志便问我，说：“老杜，你为什么对农民问题如此感兴趣？”我回答说：“因为中国到现在仍然吃的是农民的饭。”

其实，这个回答不是很全面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追述我大半生的历史。我生在农村，从小切身感到农民的疾苦，8岁便每逢农村集市打听柴米油盐的价格。13岁参加革命，更是日日夜夜住在农村，与农民一起出生入死。以后当了记者，又长期报道农村消息，直到暮年。我这大半生，没有离开过农民问题。我的一点成功，是因为农民问题；我的挫折、苦恼与过失，也是因为农民问题。可

以说，50年来，我与中国农民是甘苦共尝的。《光明日报》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我作为这张报纸的总编辑，当然对教育、科学、文化、理论、学术方面的动态应该感兴趣，也有兴趣，但这并不影响我密切关注中国农村的每一步发展和变化。常去农村走走，这是我的一种兴趣和习惯。在中国，接触农民多，反映他们的愿望与要求的记者也很多，但自始至终对农民问题怀有浓厚兴趣，自始至终报道农民的老记者，数量不算很大，但我自认为是其中的一个。

我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是个农村小学教员，母亲是手工业造纸作坊工人兼农村雇工。我的曾祖父是个富裕农民，在一个大灾荒的时候，他屯积的粮食，高价卖出，暴发起来，成了经营地主。他的土地发展到100多亩，买了三四匹骡子，还办了几个造纸作坊。由于是农村的小姓，又是暴发户，他在村里没有势力，就下决心培养子弟读书。我父亲被选中，先读私塾，后读师范，是太原师范的高材生。

辛亥革命事起，我父亲从太原回到家乡，办起了文明小学。他是定襄县蒋村的第一任文明小学校的校长。薄一波同志曾在这个小学第一届第一班读书。1983年，一波同志接见我们首都新闻单位的几个负责人，他问起我父亲的名字，我说：“叫杜来生。”一波同志笑着说：“他的学名叫杜希贤。我那几个方块字，还是你父亲教的呢！”

我父亲不光办学校，还要搞实业救国，他在我家乡试验种棉花，租人家的土地，雇长工，搞了两年，全失败了。破产以后，在心情苦闷的境况中，他抽上了鸦片。我家里只有四间房，地无一垄，全靠我母亲劳动养活我们。她白天或